

20世纪中国民族学
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凌纯声 ⊙ 著

THE HEZHEN PEOPLE
ON THE LOWER
SONGHUA RIVER



NLIC2970863923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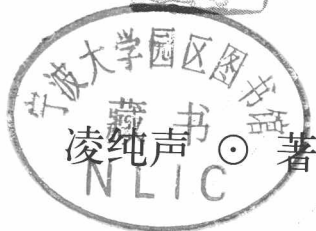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SONGHUANJIANG XIAYOU DE HEZHEZU

(上册)



NLIC2970863923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文 精

副主编：王建民 毛公宁 王铁志

编 委：文 精 毛公宁 王铁志 王建民
祁庆富 张海洋 黄显辟 宋 全
关 凯 滕 星



总 序

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自1903年林纾、魏易译出《民种学》之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逐渐开始被中国人所接受。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成立，使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立起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也开展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学者迁移到西部地区，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形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高潮。20世纪50年代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台湾学者对南岛语族族群和汉人社会展开了研究；大陆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和干扰之后，几代学者在学科重建和建设做出了辛勤的努力；香港人类学学科得以创建和发展。在曲曲折折的学科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当代学人进行反思和总结。同时，国外学者也通过实地考察或文献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著作，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与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互动。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有进一步繁荣之势。近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在重新检讨学术史的过程中，不再把历史回



顾看成是成就和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更将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学问题来讨论和认识。对于学科史的总结和认识，将会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及其再建构。然而，对于学科发展的历程所作的总结刚刚开始起步，许多学者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经验与教训，知之甚少。由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些学界同仁可能会对前人相关的著作较为陌生，在学术分析中没有条件去认真而系统地研读前人著述文本，更谈不上在学科史方面为更广泛而有深度的民族志探讨和理论建构提供有效的素材。对于训练专业人才、培养学术队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本丛书按照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 20 世纪的百年发展历程，收集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中优先编辑出版那些学术意义重大但现在流传较少的论著，以文献为依托勾画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和概况，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基础性的必读之书。“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以收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重要研究成果为主要宗旨，由丛书编委会策划并选定备选书目，民族出版社组织出版。民族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侧重民族类图书出版，承担着为民族研究提供专业背景知识的责任。我们试图通过本丛书及本社最近编辑的几种丛书的出版，推出一系列民族出版社的名牌图书，展现民族出版社的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专业定位和公众形象。

本丛书计划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选编：

一、原著部头较大的著作，采用原著重新再版的办法编辑出版。编辑中在书前加相关学者的导读文章，对该书的撰写、出版、流传过程进行介绍，评介书中的主要学术观点，说明其意义。文中在需要的地方附加注释。



二、原著部头较小的几篇合编为一册。其中既包括不同作者的几部研究相似区域或族群的著作，也可以包括同一作者一些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中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重点文章，按照专题选编出版。书前加相关学者综述性文章作为导读，说明这一专题的研究状况、研究中的成就及其不足，阐发编辑出版文集的意义。文中在必要的地方加注释。

编委会聘请了对所编辑的经典著作有较多了解，较为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导读文章。尽管导读文章只是相关学者个人的见解，但希望能够从不同角度提供一些背景性知识和学术见解，以对读者有所启发。当然，读者应当以原著研读为主，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和课题，完全可以对同一部学术著作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角度。

本丛书编委会

2003.12



导 读

祁庆富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里，以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为对象的记述，历史久远。第一个比较系统记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是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民族志资料。以后，尽管在历代的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笔记中也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民族志文献，但是，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 20 世纪初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民族学，最早译作“人种学”，后出现“人类学”一名。1926 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的《论民族学》一文，是中国民族学学科诞生的标志。1928—1940 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对于开展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曾做出过很大努力。1927 年末，在筹建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拟设民族学研究所，由于人才、经费等原因未能实现，但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增设了民族学组，由蔡元培兼任组长，组员有从法国学习归来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还有德国籍研究员颜复礼（F. Jaeger）、在德国学习过的商承祖（1900—1975 年）、从美国学习归来的林惠祥（1901—1958 年）等人。1928 年 9 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人类学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中央研究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

导
读



国民族学最早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外，许多高等学校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那时候，翻译和介绍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著作，是中国民族学起步阶段的一项工作；同时，开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也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学研究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应该承认，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创建之前，中国学者对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掌握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虽然已有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调查、采风的著述，但大多比较肤浅。中国学者正规的民族学调查，应始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1929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赴东北地区进行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份，重点在松花江下游地带，历时三个月。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凌纯声整理编著的长篇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凌纯声（1902—1978年），字民复，号润生，江苏武进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6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学家莫斯（Mauss, Marcel, 1872—1950年）攻读人类学、民族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边疆教育司司长、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省，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



究院评议员、院士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凌纯声”词条。

凌纯声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民族学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凌纯声认为，民族学可以分为记述的民族学（又称民族志）和比较的民族学两种，在中国发展民族学，必须从前者开始，因而他早期的研究活动，特别致力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自20世纪20年代末调查赫哲族起，至30年代末，他对国内少数民族进行的调查主要有：

1933年5—8月，凌纯声带领芮逸夫（1898—1994年）、勇士衡前往湖南西部的常德、桃源、沅陵、卢溪、古丈、永绥、乾城、凤凰、麻阳、芷江、黔阳、洪江、武岗等地，调查苗、瑶等族社会生活状况，搜集资料，采购标本，拍摄影片。凌纯声主要负责苗族的地理、生活、习俗、音乐舞蹈方面的研究。调查的丰富成果，于1939年由凌纯声、芮逸夫整理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原计划在1932年赴东北调查鄂伦春和索伦（鄂温克族），由于日本侵占东三省，没能实行，于是改为调查浙江、福建的畲族。1934年5月，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到浙江所属丽水、景宁、云和、遂昌、松阳、龙泉、宣平（今属武义县）等地考察畲族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生活。凌纯声根据此项调查写成《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探讨了畲族起源、艺术、禁忌与宗教及外婚制关系。他还与芮逸夫合作进行畲民宗谱之研究。

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的凌纯声与陶云逵（1904—1944年）、赵至诚、勇士衡等人赴云



南进行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凌纯声、勇士衡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么些（纳西族）、倮倮（彝族）、倮黑（拉祜族）、倮倮、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此次调查注意采用先进仪器设备，并作了体质人类学测量。直到1936年6月，凌纯声才结束调查。在这次调查基础上，凌纯声又进行滇、缅边界阿佤山的佤族研究，与芮逸夫合作进行滇、缅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研究。

凌纯声在法国留学时受过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对于调查，注重文化，讲求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回国后，亲身实践，至1934年，已积累了五次大型调查经验。他参考了国外有关著作，结合自己切身体会，撰写《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载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1936年）。这是中国最早关于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论述，对于总结国内民族调查经验，加强民族调查的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起到良好推动作用。凌纯声特别强调编写调查提纲的重要性，在多次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他编写出一份比较系统的《民族调查表格》，于1935年由中央研究院印行，随后又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上发表。《民族调查表格》确立了民族文化研究的总体框架和田野工作细则，虽有繁琐细碎之弊，但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民族学理论方法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193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全国风俗调查，凌纯声是调查问题表格主要起草人。在中国民族学起步阶段，凌纯声是最突出的实地调查者，成果丰硕，在理论方法上也有卓著建树。

凌纯声在早期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他发表《民族学与现代文化》（《国立中央大学日刊》



第 873 号, 1932 年 12 月 21 日), 阐发对民族学研究的见解, 主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 故又称做文化人类学, 或者说民族学就是文化学。他特别重视文化研究, 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应付生活 (包括物资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环境的文物和制度。凌纯声以其学术功底和研究成果独树一帜, 在中国民族学创始阶段发挥了重要影响。凌纯声积极参与民族学学术组织的建设工作, 1934 年, 他与徐益堂、孙文本、何联奎、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共同发起召开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 讨论拟定了中国民族学会简章草案。1934 年 12 月 6 日, 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正式成立, 凌纯声被推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昆明。20 世纪 40 年代, 凌纯声的主要精力用在边疆文化教育工作上。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担任民族学研究生导师。他在中央大学做过《民族学与现代文化》、《黔湘苗疆调查记》等讲演。中央大学边政学系迁回南京后, 凌纯声担任兼职教授。他在培养民族学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他担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的同时, 还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 该委员会制定了许多边地教育法规及边疆教育法案, 指导边疆教育考察和边疆教育研究。1945 年,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开始筹备, 凌纯声任馆长, 出版《中央边报》, 开展边疆文化与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尽管这一时期政务繁多, 但他的民族学研究并没有停止。1941 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 考察对象为四川西北、西康东北羌、彝、藏等民族, 旨在了解这一地区各族经济、生活状况及政治、社会、宗教、语文、婚丧制度、风俗习惯的问题, 同时搜集有关民族文物、标本。凌纯声担任团长, 对考察的组



织、实施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凌纯声将研究方向的重点转向边政学即边疆民族研究，发表了《中国边疆文化》（《边政公论》第1卷第9、10期，1942年5月；第11、12期，1942年7月）、《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期，1943年10月）、《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2卷第11、12期，1943年12月；第3卷第1期，1944年1月）等有关边政研究的论文，后结集为《中国边政制度》（1948年）、《边疆文化论集》（195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凌纯声去台湾，继续从事民族学研究事业。在凌纯声、芮逸夫等人的积极努力下，1955年开始筹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凌纯声出任筹备处主任。1965年，民族学研究所正式建立，凌纯声担任首任所长。民族研究所在台湾民族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凌纯声一方面致力于台湾民族学的建设，一方面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进行民族学调查和研究。对于台湾土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凌纯声付出大量精力。1949年，凌纯声与何联奎、卫惠林、林衡立等组成台湾中部调查团，调查仁爱泰雅人、和平布农人及吴凤邹人。1953年，凌纯声、卫惠林带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学生调查阿美人。1955年，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首次组织调查活动，由凌纯声带队，进行对屏东县来义乡排湾人的田野调查。1958年，凌纯声等对泰武的排湾人做了调查。赴台后，凌纯声在学术上的关注点是传播比较文化。在早年对祖国大陆丰富的民族调查基础上，结合对台湾高山族文化的认识，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南方文化与东南亚文化渊源关系的探索，1950年发表《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一文。之后，研究范围和运用资料逐步扩大，举凡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材料均能兼容并收，对于铜鼓、父子



连名制、崖葬、洗骨葬、猎头祭、犬祭、嚼酒、树皮布、社与庙等多种文化丛在专题探究，具体分析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1960年，凌纯声发表《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一文，之后，对封禅、丘墩、楼船戈船、龟祭、石棚等文化现象研求探讨，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视野扩展至太平洋诸岛及太平洋彼岸南北美洲土著文化，发表大量卓有见地的见解，使他成为文化史研究方面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著作有《中泰文化论集》（1958年）、《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1967年）、《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弋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1970年）、《中国与大洋洲的龟祭文化》（1972年）、《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凌纯声还通过比较凿齿、文面、崖葬、屈肢葬、楼船、干栏等文化特质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存在血缘关系的研究，认为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在远古时期的祖居地应是祖国大陆南方。凌纯声对台湾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也做出重大贡献。1955年，在他的积极策划下，创立了民族学研究所标本室。1978年凌纯声辞世，民族学研究所为纪念凌纯声的功绩，将标本室命名为“凌纯声先生纪念标本室”。1988年，该标本室改制为博物馆。

二

凌纯声将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中国民族学事业，为民族学中国化呕心沥血，功绩卓著。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上，他迈开的第一步正是进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他为中国民族学树立的开创性的历史丰碑正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分布在我国东北三江（松



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人口,据俄国学者帕特卡诺夫估计,1888年中国境内三江流域有8000~10000人。据日军总参谋部1904—1907年统计,仅松花江两岸就有2万人。日军侵华期间由于残害、疫病、冻饿死亡与外流,三江一带仅剩3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赫哲族得到新生,政府鼓励赫哲族人口繁衍发展。据全国人口普查,赫哲族人口1964年有718人,1982年有1489人,1990年有4245人,2000年有4664人。赫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八岔村以及饶河县四排村先后建立了赫哲族乡,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建立赫哲族村。

赫哲族的祖先,自古就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繁衍生息,属于肃慎系统的挹娄、勿吉、黑水靺鞨、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与赫哲族有族源关系。至清初,始以“黑斤”、“黑真”、“赫真”、“奇楞”、“赫哲”等名称见于文献记载。清代和民国年间,又常被俗称为“鱼皮鞑子”。各地赫哲人自称不同,原住在下八岔以下地区和乌苏里江畔的赫哲人被称为“赫真”或“赫吉斯勒”,“赫哲”由“赫真”音变而来,“黑斤”、“黑真”等是“赫真”的同音异写,意为“下游”或“东方”。“赫吉斯勒”即“赫真们”,意为“下游人”、“东方人”。

今天,提起赫哲族,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优美动听的《乌苏里船歌》。70年前,人口很少、鲜为人知的赫哲族被世人所熟知,主要得益于凌纯声发表的民族学名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是正式使用“赫哲族”族称的第一位民族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确认“赫哲”为正式民族族称起到重要影响。



三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通过实地调查完成的民族志报告。作者调查的地域是松花江下游“自依兰以至抚远一带”。依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倭肯河汇流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三姓副都统改置为府，满语称“依兰哈拉”。1913年改县。抚远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北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绥远州，1913年改绥远县，1929年改抚远县。这一调查路线，即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是赫哲族主要分布区域。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鸿篇巨制，内容丰富，不仅在国内民族志著作中独占鳌头，就是在当时全世界同类著述中也是出类拔萃之作。今天重读这本书，仍会为作者的赫哲之称由“赫真”音变而来的开创之功所叹服。概而言之，本书的突出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博览群书，匡正谬说

1929年以前，国外学者对于赫哲族已有不少零散的论著。凌纯声留学法国，有扎实的外语及专业基本功，对国外有关中国东北民族调查研究的外文文献十分熟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虽以调查资料为主，但没有忽略对国外研究著述的清理。特别是对于国外汉学家几成定论的“通古斯为东胡之说”首先进行批驳，在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中，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是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毫不置疑的相信：今之通



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为论证通古斯不属于古代东胡，他引述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外国文献，涉及到当时外国学者有关赫哲族研究的主要论著。可以看出，凌纯声在进行赫哲族调查前作了长期的充分准备，对于外国人的研究情况和论点了如指掌，因而能够高屋建瓴，把握全局。族源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走出国外一些学者对于赫哲族族源造成的误区，是凌纯声调查赫哲族的一个重要目标，因而他不惮繁琐，把国外研究者的论说全部罗列出来，逐一澄清。他采取由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剥离的方法，论证通古斯不是东胡民族，而为东夷的一种。接下来论述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着重探讨赫哲与 Goldi（笔者按：日文译“高里特”，汉译“高尔蝶”、“戈尔德”，是俄国人对赫哲族采用的族名）名称的来源；之后，梳理了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记述了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诚如民族学家李亦园先生对此所作出的评价：《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更重要之贡献，乃在于运用我国古籍之资料，匡正了许多著名外国学者，包括 Chavannes、Shirokogoroff、Laufer 等人，误认通古斯族即为东胡的种种错误，所以这一本书的出现，正代表着中国学者参与了二十世纪最前段，自 Bogaros（笔者按：当作 Bogoras，博戈拉兹），Jochelson 以至于 Laufer、Shirokogoroff 等学者对亚洲东北部民族研究的热潮。”^①

挑战权威的勇气在于实力。凌纯声不囿旧说，敢持己见，一方面是他熟知国外文献，另一方面在于作为中国学者，具有

^① 李亦园：《凌纯声先生对中国民族学之贡献》，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2 页，1970。



本土优势，即拥有过硬的古汉语文献功底。驳斥谬说，使用的是大量考证分析中国历史文献的方法。自先秦古籍，至清末曹廷杰实地记录的《西伯利东偏纪要》及近人著述，共引用 119 种之多。可以说当时所能见到的相关资料，搜罗殆尽。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学研究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有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这也是中国民族学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不重视包括汉文和许多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就不可能真正摸清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早期进入中国做调查研究的国外民族学家，都争做汉学家，都是从力求把握文献记载开始。凌纯声既重视实地调查，又重视历史文献，将民族学和民族史紧密结合起来，是他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他第一部重要调查报告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为以后中国民族学调查研究树立了模范的样板。

（二）特质鲜明，阐发入微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可以说是了解赫哲族的百科全书，框架宏大，内容丰富，自成一体。该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实地调查，章节上划分为“赫哲的文化”、“赫哲的语言”及附录“赫哲故事”三部分。凌纯声特别重视文化，因而，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他把文化又细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小节。实际上，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是口传文化，所以单列章节，只是为行文方便而已。可以说，凌纯声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观点，通过本书完全表现出来。凌纯声对于赫哲族文化，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微观的把握。对于赫哲族特质文化细致入微的阐释，是本书一大特色。

在文化研究中，任何遗物遗迹、人工物或社会生活、礼仪